

# 當代漢語神學理論重建芻議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

自上世紀90年代劉小楓、何光滬、楊熙楠等正式推出「漢語神學」以來，在學術界和國際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和經久不衰的影響。時至今日，「漢語神學」這一提法不僅受到漢語思想界的重視，抑且為社會大眾所接納。事實上，它已成為一股蔚然新興的神學思潮和思想文化運動。漢語神學在剛開始時尚囿於個別同道的個人志趣和志業的範圍；而在以下的發展中，由於主辦者對系統的理論建構方面沒有足夠的興趣，迄今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系統神學的可見，漢語神學的宣導者或所謂「文化基督徒」，表現出以基督教信仰為根基參與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建構的學術主旨和自覺意識，其神學的理論建構尚處在探索和發展的過程之中，其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學術界持續的關注和理論上的跟進研究。

## 一、漢語神學的問題意識和思想主旨

漢語神學的興起，可以上溯到上世紀90年代

中期中國大陸持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線，造成相對寬鬆的社會文化氛圍和國際環境。漢語神學出現，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偶然性，少數幾個對基

督教研究抱有濃厚興趣的大陸文化學者，藉助香港國際化自由港所提供的從事辦刊、研究和學術交流的便利條件，在「漢語神學」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批以研究基督教為志業的同道，他們在研究中表現出對基督教信仰的某種認同乃至認信的趨向。「文化基督徒」現象，曾經在香港和內地學術界和宗教界引發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sup>[1]</sup>這種現象從表面上看來是個別的、個人性的，而實際上，它從一個側面透現出大陸知識界在國內長期奉行的一元化意識形態主導下，力圖探索和尋求多元化的思想和信仰空間的嘗試和努力。

**摘要：**漢語神學乃是在全球化、現代化漸趨成為新的時代共識的當代境域下，由中國知識界發起的一股重建神學的當代思潮和思想運動。作為「漢語神學」的宣導者或所謂「文化基督徒」，他們對以基督教信仰為憑藉參與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有著明確的自覺意識，力主基督宗教思想在中國當代語境中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話，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提供一個以神學信仰為憑藉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支持。毋庸置疑，漢語神學的當代發展，亟須在一種新的理論自覺意識引領下實現整體的方法論突破，力圖在新的理論框架下重新檢討和審視現有的多元化的神學觀點和思想資源，將分殊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起來，納入到一個辯證統一、一體多元的神學理論架構，進而實現當代中國神學理論建構的飛躍與升華，其理論實質乃是一種思想方式和神學範式的創新與突破。

**關鍵詞：**漢語神學；現代化；普世化；理論重建

改革開放打破了「左」的一套思想禁錮，在左傾思想「大一統」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想禁區衝破了一個缺口，也使思想上向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開放、學習成為可能。從這一意義來說，「漢語神學」不僅是一項以基督信仰認信為旨趣的個人性

學術志業，也可以視為中國改革開放在思想文化領域一個特殊方面的理論成果。

學術界普遍認為，「漢語神學」作為一種神學思潮和社會思想運動，其發起、形成和開展，體現出明顯的國際化、社會化、民間化和學術化的特徵。<sup>[2]</sup>「漢語神學」不是由教會內部的神學家來主持或主導，而基本上由教會外的知識人自發地結合為一個較為鬆散的以研究基督教為旨歸的學術團體，並試圖以一種獨立的姿態與教會神學保持著良性互動的態勢和關係。它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學者個人研究的志趣和個性特色，而缺少一個統一性的神學理論的指導。漢語神學與建制內的大學體制和官方化的學術機構也有所不同。這是由於它所倡導的基督教信仰與主流的意識形態公然地對峙，處於事實上的信仰競爭關係。<sup>[3]</sup>漢語神學從其產生伊始，就與官方化、建制化的學術體制保持一定距離，從而將自己置身於一種游離於現行體制的邊緣化地位。漢語神學由此積極地面向和尋求社會層面的支持，主動推進和走向國際化的學術交流的前沿，是很自然的選擇。其主要研究基地「基督教漢語神學研究所」落地香港，也是多重要素促成，與香港地區基督教的影響力及國際化橋頭堡對整個社會的輻射力有關。漢語神學在其剛開始亮相時，就凸顯其人文性、學術性的神學特色。它給自己的定位是：以漢語文化的思想資源發展基督神學及其文化，以形成漢語思想文化之風範的基督神學文化，同時積極推動與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以及各種現代主義思想的對話，使基督神學成為當代中國文化思想的結構要素和人文學術的組成部分，並宣稱漢語神學乃是漢語世界宗教學研究者的共同志業。<sup>[4]</sup>這說明，漢語神學的發起者對發展基督教學術文化事業，以資取和利用基督教的現代性、普世性的思想資源，進而使基督神學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乃至組成部分，是有著自覺認知和使命擔當意識的。<sup>[5]</sup>

隨著基督教傳入中國，構建中國本土神學是一個被一再提起的話題。而「漢語神學」的提出，表達了一些文化學者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即所謂「現代語境」中重建中國本土神學的企圖

和抱負。「漢語神學」作為一群當代中國的人文學者共同的志業，乃是基於他們對創建以現代化、普世化為目標的基督教學術和理論範式的認可和共識，冀圖將基督教的現代化、普世化的思想資源納入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軌道。同時，他們對這一宏大主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學術觀點並不一致，甚至是互相對立的關係。中國當代本土神學發展臻至「漢語神學」的階段，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突破既往的思想範式的理論自覺。從他們的問題意識來看，「漢語神學」仍然沿續了五四時期的「古今中西之爭」，但他們力圖提出新的解答方法和方案。「漢語神學」不同意「本色神學」將基督教中國化的觀點，提出了中國文化基督化的反題，甚至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整合的觀點。「漢語神學」也不同意五四時期流行的用種種現代主義的話語和思想，來詮釋、代替傳統信仰的觀點，而是強調和突出用基督教信仰來統攝、涵蓋現代性的話語和思想。事實上，「漢語神學」雖然認識到五四學人思想範式中存在的問題，但他們自身是否完全擺脫五四時期將古與今、中與西完全對立起來的「大一統」的思維模式，尚值得探討。其實，作為「漢語神學」的宣導者或所謂「文化基督徒」，他們對以基督教信仰為依憑參與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有著明確的自覺意識，力主基督宗教思想在中國當代語境中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話，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提供一個以神學信仰為憑藉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支持。

## 二、漢語神學多重的理論進路

漢語神學乃是在全球化、現代化漸趨成為新的時代共識的當代境域下，由中國知識界發起的一股重建神學的當代思潮和思想運動。雖然漢語神學的發起者也有一種自覺的省思意識和自我定位，但迄今尚停留在一種寬泛的學問意識和思想意向的層面。劉小楓指出，漢語神學「表達了一種新的學問意識和思想感覺，一種重新理解中國的基督教及其神學的企圖」。<sup>[6]</sup>顯然，劉氏在此表達了一種在新的理論基點上重建當代中國神學的企圖，但並沒有上升到整體的方法論的高度。漢語神

學之所以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聯合體，是因為主張漢語神學的理論家、神學家之間存在著一個共同體意識，即將構建現代化、普世化的中國神學理論作為他們的共識和共同的目標。漢語神學之所以呈現出多途並進、分殊發展的態勢，這是因為他們對構建現代化、普世化的神學理論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思想觀點。進而論之，漢語神學的當代發展，亟須在一種新的理論自覺意識引領下實現整體的方法論突破，力圖在新的理論框架下重新檢討和審視現有的多元化的神學觀點和思想資源，將分殊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起來，納入到一個辯證統一、一體多元的神學理論架構，進而實現當代中國神學理論建構的飛躍與升華。

一般來說，漢語神學有廣義之分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漢語神學泛指所有以漢語為載體的神學表達。而狹義的漢語神學則指所謂「文化基督徒」的神學思想。<sup>[1]</sup>李秋零認為，「漢語神學不是一個系統的思想體系，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而是一個建立在共同志趣之上的思想運動、一個思潮。」<sup>[2]</sup>卓新平指出，「漢語神學目前顯然仍是一種內涵不清、外延寬泛的思想意向，其發展給人顯示了一條模糊且移動著的邊界」。<sup>[3]</sup>漢語神學在當下面臨著一個重審、檢討的工作，需要對漢語神學發展中「模糊且移動的邊界」作一番清理、梳理的工作，使其中包涵的不同的學術流派和思想觀點，以更加清晰的、完整的體系的面貌呈現出來。本人認為，「漢語神學」包涵了如下幾種不同的思想流派和觀點，或者說顯現出這樣幾種不同的趨勢：

### 1. 「基督教中國化」的觀點和模式。

梁燕城的「中華神學」可謂當代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一個具有標誌性的理論成果。梁氏汲取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的理論方法，運用中國哲學的思維方法詮釋基督教的普世信仰，致力於中西文化精神在形上學層面的超越性精神的深度會通、對話。他透過中西文化雙向的反省、批評和互詮互釋，開拓出當代中國神學建構的獨特視野，其神學理論關注中國社會的現實處境，具有突出的現代化、普世化的精神維度，故可以作為漢語神學在這方面的一個代表。<sup>[4]</sup>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也可謂漢語神學的一個同道。他力主以平等、開放的

精神開展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互補性比較和對話。在儒耶對話中，他汲取儒家的求同存異與和合共存的智慧，倡導一種「儒家式的基督教神學」。<sup>[5]</sup>大陸學者研究基督教，傾向於採取基督教中國化的觀點，這與官方化的「三自神學」有一定的關聯，以致於「基督教中國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三自神學」的一種理論形態。大陸學者談論基督教中國化，大都單向度地強調用中國文化的思想和範疇來詮釋基督教，卻不大談用基督教的精神和思想來詮釋中國文化，否認或較少探討基督教的普世性、超越性。其實，這種取向與中西文化的雙向詮釋和文明互鑑的精神主旨，也很難說一定是符合的。也有少數學者例外，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卓新平研究員。他力主基督教在全球化對話中的超越性精神，指出宗教中國化不是回歸傳統，而是要面向現代化、全球化的大趨勢。這種觀點很容易被海外的「漢語神學」所接納和歡迎。<sup>[12]</sup>

### 2. 「中國文化基督化」的觀點和模式。

劉小楓是「漢語神學」一個主要的發起者。他在宗教與人文的對話、比較中奉行一種信仰主義的思想路線，傾向於將宗教的、信仰的精神與人文的、理性的精神對立起來。他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根本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而只有西方的基督教為信仰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超越性目標。他主張，要以中國文化的思想資源來承納、言述基督事件和認信基督，而拒斥用中國儒道思想的體系和範疇來詮釋基督教信仰。故而，他倡導基督教，實際上乃是欲以基督教信仰來「拯救」中國傳統文化。前香港浸會大學羅秉祥教授一直是「漢語神學」的一個熱情的批評者和參與者。他站在基督教的本位立場對當代新儒家學者作出回應。針對當代新儒家根據超越性將儒家傳統和基督教分別判分為「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的類型，以此作為判教的依據，認為儒學的「天人圓融」優越於基督教的「神人分隔」的判教理論，羅秉祥堅持認為，上帝既超越又臨在，而儒家則不具有超越精神，因此當代新儒家的判教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劉小楓、羅秉祥等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為基督教神學本位立場，即堅持「中國文化基督化」。其真實要義乃在於，欲將經過現代化、普世化洗禮的基督



教精神納入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結構要素並發揮根本性影響，進而解除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建構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模式或僵固的意識形態模式即所謂「帝國義理結構」和「現代義理結構」的專斷和霸權地位，故而反對將基督教作為民族化詮釋的趨向。

### 3.「基督教中國化」和「中國文化基督化」雙向的互證互釋的觀點和模式。

何光滬與劉小楓一起，是漢語神學主要的發起者。但這兩位學者的神學觀點並不是一致的。在中西文化之間，劉小楓強調的是它們之間的異質性、不可通約性，而何光滬則強調中西文化之間的普遍性、可通約性。何光滬的「漢語神學」和全球性宗教哲學的構想，力圖為構建一種整體性、普世性的精神和價值理念作論證。他通過一種對等的、雙向的比較，力圖發現和揭示現代化、普世化乃是中西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共同的課題和目標。在當代中西文化的對話、比較中，他提出以宗教的超越性、普遍性精神為主題，並以此作為中西文化會通的基礎。他倡言中國宗教的改革，以適應和參與到世界範圍的現代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也是為解答全球化時代來臨的文化危機和問題而作出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探索和努力。何光滬從傳統與現代互動關係的理解以及中西宗教雙向的比較和互證互釋的思考中，推進了當代漢語思想語境的神學建構，也可謂開創了漢語神學另一種模式和理論進路。<sup>[13]</sup>

## 三、漢語神學重整的方法論依據

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是現代哲學的一個重大成就，代表了人類理性思維發展達到的一個高度。雖然當代哲學的發展，已經將黑格爾哲學中存在的將理性的、概念的思維絕對化的誤區揭示無餘，但對黑格爾哲學也需要辯證地看待。特別是對主要任務仍然是現代化的中國文化來說，理解和消化黑格爾哲學的精髓、精神確為必要。<sup>[14]</sup>應該肯定，黑格爾站在現代理性思維的立場，對傳統思維的弊端剖析確實是深刻的。在傳統思維的框架下，中西文化處在絕然對立的關係，這使中西文化的相互學習、溝通幾乎不可能。新文化運動提出了傳

統文化現代化的課題，但它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大一統」思維的模式，傾向於將傳統與現代、中西文化看成是全然對立的關係。在這種關係模式之下，傳統與現代的共存、聯繫和轉化，幾乎是處在其視野之外的；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成為終難完成的課題。黑格爾曾運用辯證法討論一般與個別、認識過程中肯定、否定和綜合的辯證統一的關係。<sup>[15]</sup>我們以此來分析當代中國神學的主題和思想演進，可能從紛繁複雜的無序和雜多中梳理出一個一以貫之的線索和清晰的一體化的圖景。

顯而易見，「漢語神學」的概念，首先是針對「本色神學」提出來的。對此，劉小楓、何光滬都有清楚的表述。但他們還是承認「本色神學」屬於「漢語神學」的範疇。<sup>[16]</sup>漢語神學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揚棄、超越「本色神學」的思想趨勢和祈向。但是，漢語神學並不是要否定本色化神學，而是要以本色化或中國化的神學作為其理論發展的一個新的起點和環節。漢語神學的發起者確切地指出了源於五四時期所奠定的學術思想的模式、範式即所謂「帝國義理結構」和「現代義理結構」對基督教的理解所存在種種問題和局限所在。劉小楓否認「帝國義理結構」和「現代義理」對基督教理解的合法性，不同意用五四時期的思想範式來詮釋基督教。<sup>[17]</sup>他看到五四時期所確立的現代性範式的固有問題和弊端，乃是將傳統與現代看成不相容的關係，以及在傳統思維的架構內處理中外文化的不對等的關係模式。但他本人是否完全突破這種思維模式的限制，仍須討論。以此觀之，「本色神學」構成了「漢語神學」發展的一個肯定的環節，而「漢語神學」相對於「本色神學」而言，則構成了一個否定的環節。可以說，「本色神學」的主題是以中國文化的思想和範疇來詮釋基督教，即基督教中國化，可謂一個正題。而「漢語神學」則標出以基督教的信仰和精神來詮釋中國文化，即中國文化的基督化。可謂一個反題。而從辯證思維的觀點來看，正題與反題之間並不一定是全然對立、否定的關係，而是一種辯證的否定、揚棄的關係，而且二者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整合、綜合的課題。基督教的中國化與中國文化的基督化的命題，即是如此。

當代漢語神學面臨的一個主題和任務是，在現代化、普世化的背景下重建漢語思想語境下的系統神學，藉此將所有分殊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起來。在當代，現代化、普世化乃是當代人類文化發展的兩個並行不悖的主題。二者代表了人類思想文化發展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和向度，應從理性與信仰辯證統一的關係，重新認識和整合當代世界文化包括基督教發展的整體的動態和趨勢。現代化的實質是世界文化發展的理性化、世俗化的精神和趨勢，而普世化的實質是世界文化發展的超越性、普遍性的精神和趨勢。當下學術界討論得如火如荼的後現代文化，可以說是過度現代化產生的文化課題，也可以視為現代化的某種形式的變異乃至持續。從一個大的歷史運動的全體視閥來看，傳統與現代之間構成了一種雙向的互動和張力的關係。基於傳統宗教和現代性文化作為一種對返式的矛盾運動的進程的認識，我們傾向於一種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交互的、雙向的詮釋和建構的觀點。既要從傳統宗教的觀點來了解和批評現代性的思想文化，進而範導現代性的思想文化；又要從現代的觀點來了解、批評傳統宗教，進而重建傳統宗教。<sup>[18]</sup>如果說基督教代表了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發展中傳統文化的一個要素，那麼，基督教與現代化之間也構成了一種互動的、對返式的矛盾運動和關係，必須將這兩方面統一起來思考，才能形成一個整體性的觀點。而從普世化的觀點來看待中西文化的關係，乃是一個世界文化的普遍性與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的關係。普世化倡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普遍參與的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和共建共構的世界文化的統一體。在普世化的視閥下，中西文化也是一種對等的、平等的雙向式的互詮互釋的關係，二者之間因相互關聯、互補相成的關係構成一個新的統一體。由此觀之，漢語神學境域下基督教的普世化，應該不僅包涵中國文化本位意識，即以中國文化的思想範疇和理論體系詮釋基督教所謂「基督教中國化」，還包涵神學本位意識，即以西方神學的範疇和理論體系來詮釋中國文化所謂「中國文化的基督化」。而從一個整體的「普世化」的觀點來看，「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文化基督化」乃是一個整體統一的神學建

構之一體兩面，二者分別代表了一個整全的漢語神學建構兩個不同的發展面向，它們的整合、綜合和共建、共構，構成普世化的漢語神學大廈的整體。

#### 四、漢語神學重整的理論檢討

漢語神學自上世紀末在漢語思想界異軍突起，迄今已發展成為一股舉世矚目的神學思潮。由於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特殊的相關性，其進一步發展的趨向，引發學術界的關切和思考。有識之士指出，「漢語神學」存在著因自身定位普泛化而使其神學特色消解的危機。卓新平認為，「如果沒有一種思想理論體系框架，漢語神學的歷史資源再多也不過是未能凝聚來構築其神學大廈的一盤散沙。」<sup>[19]</sup>可見，漢語神學在當下的發展面臨著在新的理論基點上整合和重建的課題。如果說「本色神學」在中國文化語境中，代表了一種對待和處理外來文化的一種相當強勢的合法性傳統和中國文化本位立場的神學建構與理論進路，其實質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來詮釋基督教；與其先驅「本色神學」相比，「漢語神學」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一種神學本位立場的介入，而在隨後發展的進程中，「漢語神學」更融入了多重的理論觀點，其總體面貌呈現為明顯的多元化的趨勢。漢語神學亟須從現代化、普世化的問題意識出發，在一個整全的理論視閥下將多重的、多元化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起來。也就是在一種神學的本源意識和超越性觀念的統率下，將漢語神學中現有的「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文化的基督化」的神學理論和觀點納入一個一體化的神學思想的建構，其實質是一種思想方式和神學範式的突破。

漢語神學的發展及問題意識與當代普世化神學思潮幾乎是同步的。何光滬指出，漢語神學處在「處境神學」、「本土神學」和「母語神學」的系列與關聯。<sup>[20]</sup>在特定的意義上，漢語神學可以說是當代普世化神學思潮在中國思想語境的延伸和發展，它既是普世化精神和理念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表達，又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智慧在普世化語境中的表達。當代西方普世化神學思潮內部存在著處境化、本土化和母語化等諸多的神學範式之間的碰撞和衝突。這些神學思想和理論觀點在其



內部存在著彼此之間相互涵容與兼容的問題，而在其外部則存在著如何涵容和處理與其它文化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是當代漢語神學面臨的問題。當代漢語神學需要極大地拓展視野，廣納涵容，創造性地對現有的各種神學思想和觀點予以綜合和整合，以實現思想方式和思想範式的重大突破與轉換。當代西方神學發展的主流或主線仍然是延續了理性主義或調和主義的路線，其要在於推進和實現宗教與人文之間的深度融合、綜合；但這種理性主義神學路線，也激起了信仰主義的強勢的反動與回歸。可見，西方當代普世化神學思潮內在的矛盾與危機，推動著其自身走向一個深度融合與整合的理論範式與思想方式的革新。漢語神學作為當代中西文化和宗教思潮融匯、融合的大背景下的思想產兒，尋求在新的基點實現理論突破和創新發展，呈現為可資期待的願景和趨向。漢語神學藉此必須凸顯和發揮一種神學的本源意識的統攝作用和方法論的創新，將當代普世化神學所蘊涵的多重的理論境域和多元化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為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在現代化的境域，漢語神學從現代化與基督教傳統的互動的、對返式的關係的理解中，開拓出一種雙向式的、互詮互釋的理論觀點和模式。而對於中西文化的關係的理解與處理，也是如此。由此，當代神學思潮中現代化、地域化、普世化這些彼此分割、隔離的境域得以聯為一體，其中分殊的乃至相互對立、矛盾的理論觀點，乃被納入一個相涵互須、辯證統一的理論體系。

在當前，人類文化的現代化、普世化向縱深發展。世界文化的普世化、一體化與各民族文化的地域化、特色化，呈現為並行不悖、共生共構的態勢。總體上，人類文化面臨著創建一個綜合統一的人類文明共同體的歷史性課題和任務。與此同時，漢語神學在現時代的發展，面臨著現代化、普世化課題的挑戰，也面臨著來自神學內部的整合、重建的契機。當下方興未艾的漢語神學運動，亟待將其中多元化的相互歧異乃至對立的神學觀點整合、統合起來，匯合為一個一體化的神學思潮。漢語神學的當代發展，亟須在一種新的理論自覺意識引領下實現整體的方法論突破，力圖在新的理論框

架下重新檢討和審視現有的多元化的神學觀點和思想資源，將分殊的理論觀點整合、綜合起來，納入到一個辯證統一、一體多元的神學理論架構，進而實現當代中國神學理論建構的飛躍與升華。其思想主旨仍然是接續和推進調和主義的神學路線，藉此將神學思潮內部的整合、綜合乃至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推進至新的境界。可以預期，作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現代化、普世化境域下深度融合、會通的思想成果，當代漢語神學的重建，一方面必然會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普世化，提供源於基督教神學信仰的思想資源和動力源泉，另一方面也必然會為中西文化的會通乃至世界文化的重建、重整，提供一個普遍性、整體性的觀點和新的思想範式的支撐。總之，漢語神學當下的發展到了一個臨界點。漢語神學的重建、重整，勢在必行。

- [1] 參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
- [2] 參見何光滬：《中國宗教改革論綱》，《何光滬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 [3] 參見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聖靈降臨的敘事》（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57頁。
- [4] 參見《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第1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年），第8-9頁。
- [5] 參見楊熙楠：《漢語神學芻議》（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8頁。
- [6] 同注[4]，第4頁。
- [7] 參見卓新平：〈「漢語神學」之我見〉，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讀本》（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第344頁。
- [8] 李秋零：〈「漢語神學」的緣起、發展和成果〉，轉引自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讀本》（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第339頁。
- [9] 同注[7]，第339頁。
- [10] 參見梁燕城：《儒、道、易與基督信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 [11] 賴品超：〈基督教生態神學可以向儒家學習一些什麼？〉，賴品超、李景雄：《儒耶對話新里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

- [12] 參見許志偉：〈「文化基督徒」現象的近因與神學反思〉，《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第31頁。
- [13] 何光滬：〈漢語神學的根據與意義〉，《何光滬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4] 參見陳村富：〈現代漢語神學何以可能？〉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讀本》（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9年）。
- [15] 參見王樹人：《思辨哲學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6] 參見劉小楓：《聖靈降臨的敘事》題記（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4頁；何光滬：《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何光滬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7] 同注[3]，第14-15頁。
- [18] 參見成中英：《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世界化》（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9年），第236頁。
- [19] 同注[7]，第344頁。
- [20] 同注[13]，第89頁。

**A Primary Study on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

Li Anz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theology is a contemporary

trend of thought and ideological movement to reconstruct theology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ecoming a new era consensus. As advocates of Chinese theology or so-called "Cultural Christians", they have a clear conscious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Christian belief, and advocate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 religious though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hina, providing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ological belief. Undoubtedly,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eology requires a holistic methodological breakthrough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new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striving to re-examine diverse theological viewpoints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under the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differentiated theoretical viewpoints into a dialectically unified theolog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chieve a leap and sublim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logical theory, its theoretical essence is a breakthrough in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theological paradigm.

**Key Words:** Chinese Theology, Modernization, Universalization,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